

牟钟鉴 著

《吕氏春秋》与 《淮南子》思想研究

设若秦朝以《吕氏春秋》治国，汉朝以《淮南子》经世，中国就会出现两千余年的开明君主制，历史则是另一番景象，至少中国与现代文明的对接要容易得多，中国的近现代转型就不至于十分艰难曲折了。



人民出版社

《吕氏春秋》与 《淮南子》思想研究

牟钟鉴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段海宝

版式设计:汪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牟钟鉴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ISBN 978-7-01-011408-8

I. ①吕… II. ①牟… III. ①杂家②《吕氏春秋》—研究③《淮南子》—
研究 IV. ①B229.25②B2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3975号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

LÜSHI CHUNQIU YU HUAINANZI SIXIANG YANJIU

牟钟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264千字 印数:0,001-2,500册

ISBN 978-7-01-011408-8 定价:4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哲学宗教学文库”（甲种12册），是本校哲学与宗教学学院11位教学科研人员的一点儿奉献。任教于我校哈萨克语系的耿世民先生，因在西域宗教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其文集也一并收入本文库。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不是很大，目前只有20位专职教师；这个院（系）成立的时间也不长，1986年独立建系，2008年更名为学院。但在吕大吉、牟钟鉴、佟德富等前辈的组建和带领下，经过二十多年的砥砺磋磨，如今已经成长为中央民族大学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学科研团队。他们秉承“进德修业”的古训，广泛吸收国内外各高校新生力量，逐渐形成了生活上随缘任运、学术上追求卓越的优良学风。此次集中出版的这批研究成果，有7种是初版，5种是再版。有些是前辈大家早年出版的重要作品，比如牟钟鉴先生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班班多杰先生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赵士林先生的《心学与美学》等，出版多年，图书市场上早已难觅踪影；有些是前辈多年研究的重要成果，比如著名的世界突厥语专家耿世民先生的《西域宗教研究》，虽然是一个文集，但主题十分集中，

学术价值极高。其他 8 种，大多是在他们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的，既有对传统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也有对当代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现在汇编、出版这套文库的目的，主要是借此积累学术成果，表达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家园“感恩的心”。

我们这个群体，不自觉地遇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近现代的中国，置身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表现为“剧烈的社会转型”。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进一步加快，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联袂上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难以回避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当前，如何完整、准确地表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的纠结中，能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价值观”的标签，在推进社会保障与婚姻立法、家庭伦理建设的过程中，面对家庭本位与个体本位的艰难抉择，社会改革的“顶层设计”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剧烈的社会变革，无疑是激发思想原创的最直接动力。广泛而深刻变革的社会舞台，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生活在这样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无疑是幸运的！理论工作者未必能够完全承担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但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本来就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我们这个群体，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温馨的大家庭里！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说她“伟大”，除了勤劳勇敢、自尊自信之外，开放、包容，更能彰显出她的美德。“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共同构成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大家庭。中央民族大学得天独厚，是国内极少的 56 个民族聚集最

为齐全的单位之一。在这里，无论是节日饮食，还是宗教信仰，都呈现出“多元通和”的良好氛围。民族、宗教方面的研究，也一直是这个国家级民族教育机构、“985工程”院校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它也始终扮演着民族、宗教等方面国家级智库的重要职能。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也奠定了新时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新校训“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准确、深刻地概括出了中央民族大学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办学理念。

实际上，中央民族大学高度关注民族、宗教、哲学问题的“文脉”，完全可以向前溯源到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延安民族学院，乃至蒙藏学校教学和研究的重点。诞生于1913年的蒙藏学堂（不久即更名为蒙藏学校），初办时只有中学班，后来又增设专科。增设了专科以后，说明蒙藏学校就具有了大学的性质。在历史上，蒙藏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民族革命干部，而且也造就了一部分了解民族宗教问题的知识精英。乌兰夫、奎璧、多松年、朱实夫、佛鼎等，都出自蒙藏学校。1941年，由于边区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独立的延安民族学院，当时担任教学和研究任务的人员有孔飞、克力更、牙含章、马寅、高鲁峰（董英）、关起义（刘元复）、海明等人。当时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等，都是极有代表性的研究民族宗教问题的力作。在蒙藏学校和延安民族学院的基础上，1951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才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深知，学术需要创新，而学术创新的不断累积，才能使学

术变得更加厚重，更加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哲学宗教学文库”（甲种12册）的出版，既体现着我们每个研究个体“进德修业”的具体内容，也寄托着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对中央民族大学“晖光日增”的美好愿望。希望这套文库的出版，能够对新时期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发挥一点儿积极的作用。

刘成有

2012年11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再版序言

我撰写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收入《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辛冠洁主编），于198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至今已过去25年。自那以后，我的研究未曾回到这个题目上。现在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再版，我不得不重新审阅一遍，目的是看看有否必须加以修改的地方，顺便校正一下文字的讹误。我得承认，在当时运用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上，有些单调和需要改进之处，如对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评价就过于简单，但该书写作所坚持的理性主义和辩证思维仍然是正确的。所以除个别地方有少许删除外，绝大部分一仍其旧。更重要的是本书所介绍和阐释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两书的综合性道家思想，包括其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知识论、辩证法及其各种文化主张，就其主要内涵而言，集结了先秦与汉初诸子百家的精华并有所深化，与社会治乱和人生问题紧密结合，从今天看，它们非但没有过时，而且由于触及社会与人生的常道真理，在两千多年以来社会实践经验教训的验证下，更显示了其可贵的价值，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当今时代各方面的人士认真加以研读和借鉴，而我们社会对两书了解和重视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我很惊异于撰著两书的思想精英群体，在

社会大的转型时期，能够以理性包容的态度运用诸子百家的资源，系统提出治国方略，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教育方方面面，既有理想追求，又有实际考量，表现出特有的远见卓识，做到了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虽然还存在着融会不够、创新不足的缺点，但已经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参考了。例如在社会管理上主张天道与人道、集权与分权、德治与法治、制度与任贤的有机结合，在文化上主张包纳百家、广罗人才、兴办文教、有因有革，在做事上主张辨察真伪、循理举事、善用众智、执要统多，在做人上主张仁智并举、情理兼具、形神相依、内外相养。总之，两书集中了各家关于宇宙和社会人生的许多智慧，而这些智慧背后有许多历史事件作为支撑，它们可以丰富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帮助我们建设得更好。

中国人有重农轻商的传统，故学界主流对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评价不高；又由于刘安是失败者，故对他主编的《淮南子》也不推崇。其实两人均可列入历史上大思想家的行列，两书亦可进入中华文化经典。秦始皇逼死吕不韦，以严刑酷法治国，二世而亡；汉武帝逼死刘安，实行高度的君主专制，虽造就了国势的强大，也遗留下帝制中央集权过度、分权不足的负面传统。设若秦朝以《吕氏春秋》治国，汉朝以《淮南子》经世，中国就会出现两千余年的开明君主制，历史则是另一番景象，至少中国与现代文明的对接要容易得多，中国的近现代转型就不至于十分艰难曲折了。两书中开明的思想也许只有到当代才能得到公正评价，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我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

牟钟鉴

2012年5月

序 言

这部书稿的原稿写于数年之前，其中一部分内容曾经过压缩纳入集体著作《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任继愈主编）之中，最近我以原稿为基础，作了一些修正补充，并增补历代考评辑要作为附录，遂成目前这样一个面貌。我把这部书稿整理出版的动机，一则由于它所评述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两书，在秦汉思想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却远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两书之间的比较研究更为人所忽略，有感于怀，不畅不快；二则由于它是我心血的凝结，敝帚自珍，人所难免，而且其中很多内容未曾与读者见过面，拿出来或可给学术争鸣增添一份参考资料。现在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我自己的想法也常在变化，看往年文稿总能发现一些陈旧的地方，回观此稿亦有是感。我既为自己学术水平起点较低而羞愧，同时又为自己头脑不僵化、时有进步而庆幸。一部作品只要是下过一些笨功夫，即使不够成熟，不妨与社会见面，让学术界与广大读者加以品评，既可推动学术讨论，又可使作者早日听到时贤的真知灼见，以利于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这就是我鼓足勇气拿出这部书稿的缘故。

我把《吕氏春秋》研究与《淮南子》研究放在一部书中，是有意这样做的，其目的就是要以这样鲜明的方式向社会说明两书之间有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以期引起人们对两书比较研究的关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相距百余年，前者成书于秦统一中国的前夕，后者成书于西汉儒术独尊的前夕，二者之间的种种差异是明显易见的。然而两书之间无论在编写过程、结构方式还是在思想内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过认真的分析比较，我认定《淮南子》是以《吕氏春秋》为蓝本而写成的，它是《吕氏春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两书同属于道家思潮。因此，我把这两部书称为秦汉之际道家著作的姊妹篇。关于两书的思想，书稿中已分别有详细的论述，这里着重联系秦汉之际儒道两大社会思潮，就两书之同异及价值，做一简要说明。

一

秦汉之际，好士、养士的大贵族，无过于吕不韦和刘安。《史记》说吕不韦有门客三千人，于是造就了战国末年最大的学术中心。《汉书》说刘安广揽天下人才，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汉初最大的学术中心。一方面有大人物主持组织，另一方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学者参加，才会有《吕氏春秋》、《淮南子》这样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学术著作诞生。吕不韦和刘安写书的志向都很远大，都想凭借学界集体力量，给先秦诸子文化做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并以此为基础进而构造一个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以便为统一的封建帝国提供较为完备的理论学

说和治国方案。从编书的过程、方法看，两书都先有编写计划，然后由学者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成书，因此两书的结构规整，篇目统一。从思想内容看，都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道德、军事等各重要领域，又兼采道、儒、阴阳、法、墨、兵等各家学说，而又能综合成一新的体系。《淮南子》的《时则训》基本上承袭《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纪首，只是改动了标示月份的方法，又将原五方配五帝、五神、五音等内容，移于《天文训》，“神”改为“佐”。《吕氏春秋·序意》提出“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根本指导思想，《淮南子·要略》则谓“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两者基本一致。这不是最明白无误的仿效和挪用吗！

尤其需要指出，两书的基本思想倾向一致，都推崇老庄哲学，并以其为主干，融合、贯串各家学说，从而形成一种综合性理论。这种理论的综合性，恰巧就是秦汉道家的特色，如司马谈所说：“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之要指》试看儒、墨、名、法诸家思想，对于形成两书的政治，经济、文化观点有重要影响，然而无一家成为全书的哲学理论基础。阴阳家的思想在《吕氏春秋》中建构了一种形式完备的世界图式，然而未能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它在《淮南子》中的地位更有所下降。两书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例如，“道”是两书宇宙发生论的基本概念。《吕氏春秋》将“道”（又称“一”或“太一”）看做宇宙始初状态，又表示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叫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大乐》），“凡彼万形，得一后成”（《论人》）。《淮南子》有《原道训》，系统阐发老子的“道”，提出了历史上最系统的宇宙发生论。

《吕氏春秋》从老子“无为”论中引申出“是法天地”和“因则无敌”的贵因论，作为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全书的政治论、人生论及其他内容，处处体现“顺其自然之性”的基本思想，即“贵因”。《淮南子》也反复强调“因其自然而推之”的原则，并赋予“贵因”和“无为”以更多积极进取的因素，这一原则亦是本书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基点。这些思想是两书的基础和核心，其他各种思想都围绕道家的自然论和“贵因”论而展开铺陈。此外，老子利害相生、以柔克刚的辩证法思想，重生轻利、避祸全身的养生论，也都是两书社会人生论的基调。

再看一下庄子的影响。《吕氏春秋》大量吸收《庄子》，主要有：万物本性不可变，“无为”在于使万物各安其性命之情，天道运行无所滞留，君无为臣有为，轻物重生等。《淮南子》对《庄子》的采撷更加广泛，主要有：顺性因民，人性和愉宁静，养生以养神为主，对生死问题应豁达明智等。仍然是尊重自然、承认差别、无为而治。

两书作者对老庄学派的评价高于其他诸子。《吕氏春秋·不二》谓“老耽（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以老为先。《有度》说：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

所谓“通乎性命之情”，即老子的自然无为，《庄子》的不失万物性命之情，因其固然而然之。也就是合乎人情，顺乎民心。《吕氏

春秋》认为这是治国之本，只有首先抓住这个根本，儒墨的仁义之道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老庄与儒墨是内学与外学的关系。这一思想亦为《淮南子》所继承，而有先道德后仁义的治国方针。所谓“道德”在当时是道家关于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概念，不是后来儒家讲的伦理性的仁义道德。《本经训》认为“道德”是治世之本，仁义礼乐是圣道的陈迹。《览冥训》提出治国要“持以道德，辅以仁义”，也就是以道家为主，儒家为辅。在这些地方，两书都表现了秦汉道家的两大特色：一是理论上倚重老庄，二是内容上兼采百家。因此，两书除了崇尚老庄之学这一点相同外，关于月令与政令相配，疾学尊师，法不可拘守亦不可无，法高于君，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治民以怀柔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等思想，也是相同的，是从儒、法、阴阳各家引发出来的。当然两书有高低、精粗之分，道家倾向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有由弱而强的趋势，所以我把《吕氏春秋》看做是秦汉道家的初创之作，《淮南子》则是秦汉道家的最高理论结晶。

学界对于《淮南子》是道家作品基本上无异义，但在《吕氏春秋》倾向哪家的问题上，则众说不一，迄无定论。不承认《吕氏春秋》是道家作品的学者，都把《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两书割裂开来，分别对待，忽略了两书之间的亲缘关系。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从根本上否认《吕氏春秋》成一家之言。如冯友兰先生就一向认为《吕氏春秋》是杂家，折中拼凑，与《淮南子》不同。其二是在承认《吕氏春秋》有主导思想的前提下各持一说。如《四库提要》说它“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清人卢文弨认为“《吕氏春秋》一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书〈吕氏春秋〉后》）；陈奇猷先生新著《吕氏春秋校释》则说“吕不韦的主导思想是阴阳家之学”，徐复观先生

《两汉思想史》亦同此论。我在上面已经说明,《吕氏春秋》是具有道家色彩的综合家,有其条贯和取舍标准,基本上以道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言。《淮南子》亦是广采博取而归之于道。扬刘氏而抑吕氏难以说通。有的学者以吕书中宣扬宗法伦理为据,断定该书倾向儒家,似乎道家不该如此,岂不知秦汉道家已不同于老庄,不再排击儒学,转而明确肯定三纲五常的宗法制度与思想,只是秦汉道家在总体上崇道,不把宗法制度与伦理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先老庄而后“六经”。吕书恰是这样,前已有论。并且吕书中儒家思想的比重远不如《淮南子》大,而《淮南子》并不是儒家著作。认为阴阳五行思想是吕书重心的学者,其根据之一是说阴阳学说被安排在全书首位,纪、览、论的首篇都是阴阳说,又篇章最多;根据之二是说吕书中的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书中其他成分所可比拟。我以为这两点都需要商榷。诚然,阴阳五行说在吕书中占有显著地位,自身亦构成庞大理论框架,然而这个框架与多数篇章之间只有论题范围上的相应相属关系,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极少思想观点上的沟通。例如,十二纪首篇为该月的月令,作者按春主生、夏主长、秋主收、冬主藏的特点,将四组论文(每组四篇)分别归属于四季之下,这四组论文在论题范围上相对地体现生、长、收、藏之义,然而各组论文如何讲生、长、收、藏,从四季的特点上并不能直接推断出来,也就是说,十二纪所属各篇论文的具体论点并不受月令中阴阳五行思想的约束,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至于八览、六论,除了《应同》、《召类》数篇代表阴阳五行思想外,其余皆与阴阳五行无明显关联。可见阴阳五行学说在吕书中仍属局部现象,尚未来得及贯彻于全书,不具有支配地位。虽然如此,正是这一部分为汉代经学所重视,不断膨胀,把影响扩展到全社会,以至形成

有汉一代以天人相感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是后来的事，不应逆向推断，得出阴阳五行说原本在吕书中起主导作用的错误结论。一书中次要成分后来比主要成分影响更大的情况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卢文弨关于吕书宗墨氏之学的说法也难成立。墨家思想在吕书中主要表现为主张爱利之道、尚贤、节葬、辩察等。《当染》大部分录自《墨子·所染》，更能证明吕书作者中有墨派人物。然而墨家思想最主要的特征——“兼爱说”，并不是吕书的主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主调还是道家的“贵因说”。吕书主张“义兵说”，与墨子的“非攻说”亦不相合。

比较合理的说法，还是将吕书归属于秦汉道家。东汉高诱距离《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时代较近，而且是两书较早的注作者，他的见解应为我们所尊重。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道家的“道德”是该书追求的最高目标，道家的“无为”是该书的纲领，其次才以儒家的“忠义”为伦理的准则，以法家的“公方”为行为的法规。这样，高诱就肯定了吕书倾向道家，并兼容儒法。高诱在《淮南子叙》中说，此书“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然其大较，归之于道”。高诱认为《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都倾向于道家，只在评论分寸的掌握上有些差别。还有，高诱不像后来一些学者贬吕褒刘，他对两书都有很高的评价。高诱认为《吕氏春秋》可“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吕氏春秋序》）；又说《淮南子》“其义也著，其文也富”，“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淮南子叙》）。我以为高诱的见解是中肯的，比较合乎实际。

历史上亦有些学者看出《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有密切的

先后继承关系，对两书作出一些比较分析。如汉末蔡邕说：“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蔡中郎集》）宋代高似孙说：“淮南王尚奇谋，募奇士，庐馆一开，天下隽绝驰骋之流，无不雷奋云集，蜂议横起，瑰诡作新，可谓一时杰出之作矣。及观《吕氏春秋》，则《淮南王书》殆出于此者乎？”（《子略》）近人蒋伯潜著《诸子通考》，谓：“《淮南子》成于门客之手，与《吕氏春秋》同”；“《汉书》本传曰：‘安好书，所招致率多浮杂。’故是书内容之杂，仍与《吕氏春秋》同”。可惜上述议论太简略，未能系统展开。而对两书做比较研究，不能停留在与两书直接相关的资料比较上，还应把它们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

二

《淮南子》成为《吕氏春秋》的续篇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战国中期以后，列国由角逐争雄走向政治的统一，与此同时，思想文化也在百家争鸣中加强了彼此间的渗透融合。这种文化融合趋势既受政治统一目标的推动，又在为政治统一的实现创造着思想条件。文化上的融合大致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固守本学派的门户色调和学术传统，在自己旗帜下容纳诸家异说，如荀子师法仲尼，标榜儒家，实际上是兼儒法而合名墨。《韩非子》、《墨经》皆属此类。另一种方式是跳出学派圈子，对各家学说进行综合整理和发挥。这种总结以往文化的方式，要有一种合适的文化环境，即各派学者云集，实行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